

“环中国海文化共同体”历史上的跨海人文旅行 ——明朝高丽文人郑梦周的渡海入京与其人其诗的古今影响

曲金良

(集美大学 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明朝初期, 朝鲜半岛高丽-朝鲜王权鼎革, 郑梦周作为高丽末重要官员和文人, 多次渡海赴京, 对当时、对后世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历史进程, 影响深远。其在中国的影响, 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明初, 来自高丽末朝鲜初王府的遣官入京奏报, 郑梦周是作为高丽王府的“权臣”“奸臣”定性的。第二个时期始自朝鲜初期成书的《高丽史》对郑梦周评价的彻底转变。于是中国本土, 对郑梦周的定性与评价, 也随之彻底转变。到了明万历进士钱谦益编纂《列朝诗集》, 明朝属国朝鲜的郑梦周诗成为重要选项, 因之影响巨大。《列朝诗集》于清康熙间传入朝鲜, 受到朝鲜一方的高度重视。清中叶朱彝尊编选明代诗歌总集《明诗综》, 郑梦周又是必选, 并按语对《高丽史》不没郑氏事迹大加称赏。晚清吴庆坻《蕉廊脞录》卷五又记有《朝鲜诗录》在同治年间辗转抄阅流传的情况。《朝鲜诗录》共四册, 录郑梦周诗“几盈二册”, 可见郑梦周及其诗在明清中国本土的影响。第三个时期是现代中国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 是新中国学界对郑梦周的“重新发现”高度重视。第四个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一方面是中国学界有了不少全面研究, 另一方面是中韩两国共同对郑梦周在中国本土的历史足迹的考察发掘、缅怀纪念, 和对其当代价值的共同认同。

〔关键词〕“环中国海文化共同体”; 郑梦周; 渡海诗; 中国本土; 朝鲜半岛; 历史影响

〔中图分类号〕G 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89X (2021) 01-0008-12

一、东亚“环中国海文化共同体”的历史构造与近代解体

东亚, 从地理空间而言, 指的是整个东部亚洲; 而从文化空间而言, 则指的是由中国和历史曾接受中国文化为主导文化、现代以来则以各自民族文化为主体, 而依然传承着中国传统文化主体要素的东部亚洲各国所构成的“环中国海”区域。中国文化普及于“环中国海”的东亚区域而形成的传统文化的主体要素, 主要有儒家思想、伦理道德、神灵信仰、政治制度、世俗观念、岁时节日、社会礼仪、饮食习俗、汉语文字-汉源语汇等。人们说的“东亚文化”, 一般指的是这一文化内涵。须知, 这是在数千年来的长期历史中形成的。

准此, 属于“东亚文化”的地区, 主要包括中国本土、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中南半岛、南洋群岛。所谓东亚圈、东亚文化圈, 主要由这些地区构成。这一区域从地理空间上看, 都属于环“中国海”区域, 亦即人们现在常说的“东亚地中海”区域; 从“东亚文化圈”的形成看, 主要是通过海路, 亦即主要是靠海洋网络连接成的; 其精神、物质、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中, 海洋本体元素、海洋介质元素突出。所以就“东亚文化圈”的文化特点而言, 这是一个巨大的“海洋文化圈”; 中国与“环中国海”的周边世界, 主要是靠海洋连结起来的。从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上看, 也如滨下武志所论, 是东亚的“朝贡体系”“朝贡贸易圈”、政治-经济-文化的“共同体”。“政治-经济-文化”中的“文化”是狭义的“文化”; 广义

〔收稿日期〕2020-1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 (18VJ067)

〔作者简介〕曲金良 (1956—), 男, 山东东营人, 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海洋文化理论、历史与文化遗产研究。

上,“政治-经济-文化”都是“文化”。所以,它的实质,就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即“环中国海文化共同体”。^[1-2]

东亚这一“环中国海文化共同体”,就其空间生成而言,主要是跨海洋的,通过航海的、受海洋环境条件影响下的人文社会型塑;从其历史内涵来看,历史上一直占据着主导、领导和统辖地位的,是中国历代王朝。在历史上,这一“共同体”的海外各国,无论是文化上、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受中国/中原王朝的影响,既具有“天下一体”制度、观念与文化上隶属于中国/中原王朝的藩属性,又具有“高度自治”的地区特性,因而有些地区政权如日本、安南(今越南),历史上曾几度长期不朝、反叛、僭越称帝,甚至“反攻大陆”,但从历史地长时段来看,这都是“短暂”的“非常态”时期。

东亚“环中国海文化共同体”这一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构建,起源于先秦,成制于秦汉,兴盛于隋唐,发展于宋元明清,衰微并终结于晚清,后为多个各自“独立”的“现代国家”所代替。在古代,环中国海之中央朝廷与海外“诸藩”的关系,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君主“天子”和藩臣“诸王”的关系;而今天的中国与这些海外地区的政权关系,是现代“国家”理念与制度下的国与国之间的对等关系,即平等的国际关系。在现代,各“国”是没有隶属关系的,全球范围的“联合国”也好,或大或小的“区域同盟”也好,虽然各成员国在影响力上有大小、强弱不同,但至少在制度、体制上,相互之间是“平等”的,这与东亚古代中国中原王朝与周边政权之间的宗藩制度及其相互关系,绝不可同日而语。

“环中国海文化共同体”原本的中外“宗藩”政治-文化制度“共同体”的解体,是晚清时期西方势力东侵的结果。西方东侵始自明代中叶,至晚清之前,主要是蚕食了南洋地区的一部分中国藩属地区,尚未对中国本土亦即“环中国海文化共同体”的核心区域形成破坏,而且由于明清王朝都一直努力将“西洋”诸国纳入“环中国海文化共同体”的宗藩政治制度及其“朝贡”贸易制度之中,而且行之有效,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明清帝制王朝作为“天

朝上国”的形象塑造。但自晚清鸦片战争失败,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主体就步入了日益残破的历史进程。其实,如果晚清王朝此时尚未腐败透顶,朝廷中枢尚未权奸当道,西方殖民者不能找到窃据晚清朝廷大权的代理人,与西方殖民者不能形成事实上和心理上、经济上、文化上的“里应外合”,那么晚清的命运、晚清还是不是“晚清”,或许都将是另一番结局。正是晚清的“残破”,使得日本对自己与中华本土的传统关系及其前景放弃了希望,也就主动放弃了作为“环中国海文化共同体”传统一员的坚守,由此才开始了其“明治维新”,走上了效法西洋、“脱亚入欧”的对外殖民之路——先是对其南邻琉球、北邻朝鲜开始了一步步侵略、蚕食,进而通过甲午战争将已经被西方侵略、腐蚀得腐败透顶的清朝政府彻底打败,从而开始了其进一步吞并台湾、琉球、朝鲜、侵占中国东北进而大半个中国本土的野蛮战争进程。

传统“环中国海文化共同体”中各个地区自近现代以后,陆续进入“民族国家”的“独立”的社会转型时期。在中心地区中国,这一转型始自辛亥革命将晚清王朝推翻,建立中华民国。但中华民国并未摆脱西方和日本殖民主义的控制和侵略,甚至被侵略、殖民的程度更为加深,外侵、内战、买办资本、官僚资本的盘剥多重叠加,“三座大山”使得中华民族陷入更为水深火热之中。而在“环中国海文化共同体”的其他地区,则全部落入西方、日本殖民侵略占领之下,直到中国和各地的抗日战争胜利、世界范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日本法西斯、西方法西斯无条件投降,这些被殖民地区才开始走上了漫长、艰难的“民族独立”“国家解放”的道路。

照理说,“环中国海文化共同体”这一重大历史事实,是具备历史知识的人都应有所了解的“常识”。然而,当今学术界对东亚数千年历史上的“环中国海文化共同体”这一事实的表述和概念使用却有失准确,未能客观传达历史原貌,甚至“顾左右而言他”。例如,以“文化圈”取代“共同体”,以“中外关系”取代“宗藩关系”,以“来华访问”取代“入京朝见”,以“朝贡贸易”取代“朝贡制度”,以

“海商贸易”取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政治-经济-文化一体的制度内涵,如此等等,既缺失了对待历史应当持有的严肃态度,是对历史的有意无意歪曲,更悖离了学理探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笔者择取“环中国海文化共同体”历史上的一位几番渡海来朝的文官——明代朝鲜半岛上的高丽-朝鲜王权交替时期的郑梦周,通过其自身经历及其诗文在中国本土暨朝鲜半岛上的古今影响,以见“环中国海文化共同体”的具体的历史活态之一隅及其影响至今的文化内涵之一例。

二、朝鲜半岛文官郑梦周渡海赴京的经历和诗作

郑梦周(1337—1392),草名梦兰,9岁改名梦龙,后又改名梦周,字达可,号圃隐,谥号文史,庆尚道永川人,朝鲜半岛高丽末期著名官员、理学家、诗人,被誉为朝鲜理学之祖。高丽王祺九年(1360)中举,十六年(1367)出任学官,后任大司成,负责同明朝廷的联系。时高丽王府在归附明朝还是北元上分歧严重,王权变乱,1374年王祺被杀,辛禑立,杀明朝使臣,重新投靠北元。梦周反对不成,遭放逐。辛禑王八年(1382),明朝廷大军压境,辛禑王被迫连续遣郑梦周等赴京朝见太祖皇帝。郑梦周圆满完成任务,重建高丽为明朝廷藩属国的关系。1388年,辛禑王复又反叛,派李成桂出兵辽东,李成桂遂发动兵变,废辛禑,立其子辛昌为王,次年又废黜辛昌,立王祺后裔王瑶。郑梦周在此期间任守门下侍郎。1392年,王瑶自感李成桂实力日大,为求自保,与郑梦周密商反李成桂。李成桂派人暗杀梦周于开城的善竹桥,梟首于市,抄没其家,废王瑶自立。自此,李成桂接连遣使进京“赴朝廷奏达”,以“权知国事”上表称臣,如:“权知高丽国事臣李成桂言:伏惟小邦……推戴臣权知军国事。臣素无才德,辞至再三,而迫于众情,未获逃避,惊惶战栗,不知所措。伏望皇帝陛下以乾坤之量、日月之明,察众志之不可违、微臣之不获已,裁自圣心,以定民志。”^①其后又请改国号,明太祖皇帝诏国号为“朝

鲜”。李成桂不断遣使赴京谢恩、朝贡、请封,但明朝廷因其为篡权乱国,一直不封其为王,李成桂因此也一直上表自署“权知国事”。其后几经权力更迭,至1400年其五子李芳远继位请封,明朝廷才册封其为第一位朝鲜王。芳远因郑梦周忠义,复为其翻案,追封其为“大匡辅国崇禄大夫领议政府事、修文殿大提学兼艺文春秋馆事、益阳府院君”,入祀孔庙。自此,郑梦周的形象重新在朝鲜半岛树立了起来。

郑梦周曾分别于1372年3月至1373年7月、1382年4月、1382年11月、1384年4月至1385年4月、1386年2月至7月、1387年12月至1388年1月,6次奉派赴京入朝^[3],其中3次(第2、3、6次)因明朝廷拒绝,未果;其中1次遭遇海难,在渤海遭风翻船,大难不死,受朝廷嘉赏。他是在朝鲜半岛与明朝中央政府的关系上舍生忘死求为“一体”的著名文臣。他一生创作了大量诗篇,其中吟咏记述赴京入朝的渡海过程、往返于“登州贡道”上的经历、登岸后赴京路上在明朝本土山东、江苏、浙江(宁波)等地及大运河的游历,占有相当的比重。现存诗319首,其中赴京入朝使行诗124首。^[4-5]由于郑梦周不同寻常的人生悲喜经历、为官为文成就包括诗歌创作成就,其不仅在朝鲜半岛历史上,而且在中国历史上,直至今日,都影响深远,使我们不能忽视。

郑梦周渡海入京的海上航道,就是古代所称指的“登州海道”或“登州贡道”(郑梦周诗《贡道接鸡林》)。登州自公元707年唐王朝在山东半岛设立,治所先是在文登,后移至蓬莱,管辖山东半岛东部地区,兼押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大陆东北地区的海路交通交涉包括朝廷出使、属国入朝等事宜。唐朝时凡出入中国本土的新罗、日本、渤海等国的使节、僧人、商人等,在北方地区都需要在登州口岸办理出入境官牒公文和迎送手续——是谓“登州海行人高丽、渤海道”(唐宰相贾耽《皇华四达记》)。唐朝时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和东归、新罗人崔致远入唐求学和东归,都被要求在登州登岸或启航。^[6]即使因遭风或其他特殊原因未在登州登岸

① 朝鲜《李朝实录》“(朝鲜)太祖壬申元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西元1392年)条。

或启航,也必须远行到登州办理出入境手续,才不是“偷渡”。正如《宋史·高丽传》所载,“高丽往返,皆自登州”。唐宋都在登州建立“新罗馆”“高丽馆”,处理朝鲜半岛来使来贡事宜。所需费用,由朝廷划拨或“别给”,以“充高丽贡使之费”(宋天禧五年)^①。明、清时代,登州继而成为高丽、朝鲜使节航海入京的主要出入口岸。据统计,仅在明朝277年中,高丽-朝鲜使臣赴京入朝就有1252个行次,平均每年约有138个行次的使臣及使团来往穿梭在海路和陆路贡道上。^[7-8]海路赴京的具体路线,在明朝前期,如郑梦周、权近、李詹等,主要是过鸭绿江后从旅顺渡海经庙岛群岛,从蓬莱登陆,然后取道赴南京;而后来的全湜、金尚宪、吴天坡等,则是从鹿岛出发,经长山岛(辽宁长海县)、庙岛,从蓬莱登陆,再后从陆路去北京。因此使臣候风经过的沙门岛、三叉河等处天妃宫,都留下了许多朝鲜半岛使人们的妈祖诗咏。^[8-9]

高丽、朝鲜使节郑梦周、李齐贤、郑道传、朴宜中、金九容、李詹、李崇仁、权近、李稷、吴允谦、全湜、李民成、金尚宪、高用厚、金地粹、崔有海、申悦道、吴肃羽、李献庆等,大量文人使臣从登州上岸和启航东归,都留下了大量关于登州、关于渡海的诗文。^[10]郑梦周及其诗,只是一例。

明朝洪武五年(1372),高丽使节洪师范、郑梦周等渡海来朝,不幸发生海难。据《明太祖实录》卷七五载,太仓卫八月癸卯(二十九日)向明太祖上奏:“高丽使者洪师范、郑梦周等渡海遭飓风,舟坏,师范等三十九人溺死,梦周等一百十三人漂至嘉兴界,百户丁朋以舟救之”。^[11]时郑梦周任书状官,虽正使洪师范遇难,依然赴京入朝,完成使命。因其奏文“文理条畅,援引典故,甚是得宜,上意欢忻”,受到洪武皇帝的嘉赏,洪武帝还亲自蠲免了高丽这次的全部贡品,敕谕退回,并恩准了高丽王府奏请遣子弟入太学等情。

次年,郑梦周一行从登州海道归航,留下了《登州过海》诗:

芝罘城下片帆张,便觉须臾入杳茫。
云接蓬莱仙阙远,月明辽海客衣凉。
百年天地身如粟,两字功名鬓欲霜。
何日长歌赋归去,蓬窗终夜寸心伤。

虽入朝奏请一一获得皇上恩准,但想来航时使团人马浩荡,因遭海难,归航时见海神伤,担惊受怕自不待言,但身负朝廷-王府重任,岂可畏死?瞻念未来,他知道,包括他,包括别人,今后还会不知有多少人需要航海往返在这样一片苍茫浩渺而又风高浪险的海上。

明洪武十五年(1382),即高丽辛禑王八年,四月,高丽辛禑王“遣门下赞成事金庾、门下评理洪尚载、知密直金宝生、同知密直郑梦周、密直副使李海典、工判书裴行俭等如京师,进岁贡金一百斤、银一万两、布一万匹、马一千匹。”^②十一月,高丽辛禑王又“遣同知密直司事郑梦周、版图判书赵□如京师贺正,仍进陈情、请谥、承袭表。《陈情表》曰:‘岁贡下之奉上……臣禑少而孤苦,加以愚蒙,处朝鲜山海之荒闲壤地,又值日本干戈之际,财赋凋残,虽怀事大之忠,未彻烛微之鉴。岁月逝矣,日夕□然。伏望陛下记先臣翼翼之心,怜孤臣□□之□,示教条之宽大,通行李之往来,则臣谨当保一方之人民罔愆于度,为万世之臣妾永观厥成。’《请谥表》曰:‘……先臣于洪武七年薨逝之后,累次上表请谥,未蒙明降。岁律悲于九更,天聪敢于再渎。伏望陛下特颁恤典,以慰贞魂,则臣谨当率先考以移忠,与东人而祝寿。’《承袭表》曰:‘茅土之封,帝王所以树屏……伏念臣年方十岁丧我先臣,对影无依,悼岁月之逝,抚躬自幸,蒙天地之生。成第锡命之尚□,稽肆倾心之益切。伏望陛下以九经怀柔之道,举万国封建之权,□臣之微,纘父之服,则臣谨当嘉与父老,祝皇龄之万年,以至子孙修侯,服于百世。’”^[11]

诸如此类,举凡属国的一切大事,都须奏报朝廷批准,或唯朝廷之命是听,因此或国王亲自赴京朝觐,更多的是遣使赴京入朝,这样的渡海往返,自是经常性的。而所遣之使,尤其是正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七“天禧五年”条。

② 【朝鲜】高丽史:卷一三四《列传》四七“辛禑二”。

使、副使,皆多文人学士,因此相关的诗文创作,又自是少不了的。郑梦周的相关诗作,就留下了很多。再如洪武十九年(1386)郑梦周渡海赴京^[12],留下的登州之作《过海宿登州公馆》:

三月十九日,过海宿登州公馆,郭通事金押马船阻风未至,因留待。

登州望辽海,邈矣天一涯。

溟渤限其间,地分夷与华。

我来因舟楫,利涉还可跨。

昨日海北雪,今朝海南花。

夫何气候异,可验道路赊。

客怀易凄楚,世事喜蹉跎。

偕行二三子,相失迷风波。

终夜苦忆念,耿耿闻鼓挝。

晨登蓬莱阁,浪涌山嵯峨。

归来就孤馆,欹枕空吟哦。

郑梦周在登州驿馆中,还作有《蓬莱驿》,云:

昨日张帆涉海波,故园回首已天涯。

地经辽雷军容壮,路入登莱景物多。

客子未归逢燕子,杏花才落又桃花。

同来幸有韩生在,每作新诗和我歌。

虽经海上航行颠簸,风高浪险,远离故园,身在异乡,心态还是乐观的。另一首《蓬莱阁》,表现出了他的博学多才,对中国历史及其典故的谙熟和妙用:

采药未还沧海深,秦皇东望此登临。

徐生诈计非难悟,自是君王有欲心。

他在登州期间,还多次到蓬莱阁凭吊苏轼史迹,包括《海市》诗碑。其《登州仙祠》诗云:何处登临慰我思,芝罘城下古仙祠。

只嫌汲汲南归疾,未和坡翁海市诗。

他在渡海中羁泊沙门岛,作《沙门岛》,成为高丽使节中最早关注海神妈祖(北方称“海神娘娘”)信仰的人,为海神信仰的传播和记录做出了贡献。^[13]诗云:

神女祠何在,沙门海上峰。

戎车连鹤野,贡道接鸡林。

利涉由灵贶,徽封自圣心。

泊舟来酌酒,稽首冀来歆。

郑梦周的海路诗作,先后影响明、清朝鲜半

岛高丽末期、朝鲜时期,直至今日。600多年里,至广至深。^[14]在郑梦周的影响下,高丽和朝鲜使节仅吟咏记述登州蓬莱、登州海道的,今见存诗就有100多首。^[15]

三、郑梦周在明清时代中国的影响

“在韩国儒学史上,几乎众口一词地尊奉郑梦周为东方理学之宗祖。”^[16]圃隐学,即郑梦周研究,在韩国已经成为一门集哲学、史学、诗学、政治学、社会学、族群学和地方文化学等学术研究与应用于身身的大学问。影响所及,在中国,不但引起了不少学者的高度关注和重视,而且引起了与当年郑梦周多次从朝鲜半岛渡海入朝游历行迹所至的相关各地政府、文化机构和民间社会的高度重视。这就是说,圃隐学,已经不再仅仅属于韩国,而是也同时属于中国,亦即已经成为韩国和中国的共同的学问——这也是韩国学者都乐见的;而究其缘由,是因为中韩两国的历史文化的密不可分,是一个共同体,郑梦周就是这一共同体中的重要一员,影响至深至远的重要一员。

郑梦周在明清时代中国的影响,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明初根据高丽末朝鲜初朝鲜半岛王府向朝廷的奏报。《李朝实录》载“太祖壬申元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1392)秋七月十七日丙申”条,记李氏朝鲜王府遣官赴京向朝廷奏报高丽-朝鲜王权更迭事:

太祖(朝鲜王府对其首任国王的追封谥号)即位于寿昌宫。恭让王逊于原州。都评议使司及大小臣僚贤良耆老等请令知密直司事赵胖赴京申礼部曰:“……国人禀奉恭愍王妃安氏之命,以王氏宗亲定昌府院君瑤权署国事,及今四年。瑤又昏迷不法……又其权臣郑梦周等潜成奸计,欲生乱阶,乃将勋臣李成桂、赵浚、郑道传、南閻等譖于权署国事,令有司论劾,以致谋害。国人怨愤,共诛梦周……惟门下侍中李成桂泽被生灵,功在社稷,中外之心,夙皆归附。于是一国大小臣僚闲【贤】良耆老军民等咸推戴。令知密直司事赵胖前赴朝廷奏达。伏乞照验,颇为闻奏,俯从輿意,以安一国之民。”

又《李朝实录》“太祖壬申二年、明太祖洪

武二十六年（1393）六月乙亥朔”条，录朝鲜王向朝廷洪武帝奏报的表文：

遣中樞院学士南在奉表帝京曰：“诚命昭示于丁宁，天威不远于咫尺，兹深悚惧，用切吁呼。窃念以庸陋之资，处僻远之地，然粗闻圣贤之垂训，故得知华夏之当尊。洪武二十一年，辛祸、崔莹等妄兴师旅，欲向辽东。二十五年，王瑶、郑梦周等继祸邪志，将犯上国。臣晓谕一国臣民，以谓夷不可以乱华，下不可以犯上。众皆知其逆顺，彼咸服其罪辜……”

可见，据《李朝实录》，郑梦周在高丽末朝鲜初对明朝廷的奏报中，是作为“权臣”“奸臣”定性的。

《李朝实录》以编年形式记载李氏朝鲜始自其太祖、终至哲宗的25代国王约500年间的史实，其《太祖实录》十三卷于其太宗十三年（1413）首先编成，其世宗八年（1426）编成《定宗实录》6卷，5年后又编成《太宗实录》36卷，其后陆续编成后世各王实录，终至其哲宗，最后其高宗、纯宗二王实录因系日本人控制编修，为史家不论。《太祖实录》编成时，距离其太祖之后不远，其当时的“实录”，反映的是当时王府、文臣和史臣的价值观与历史观。当时对郑梦周的评价就是如此。

那么在中国本土，明代初期的朝野，对郑梦周的定性与评价如何？曰：自然是与高丽末朝鲜初的朝鲜半岛一致的。

先看《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该书于建文元年（1399）始修，永乐元年（1402）、九年（1411）再而重修，十六年（1418）修成，与朝鲜《李朝实录》之《太祖实录》（1413）成书大致相当，对郑梦周的相关记载与臧否，也依据“高丽知密直司事赵胖等持其国都评议司奏言”直录，见卷二百二十一“洪武二十五年九月”。

李氏朝鲜对郑梦周的评价，到了其世宗三十一年（1449）金宗瑞、郑麟趾等奉编《高丽史》，至其文宗元年（即明景泰二年，1451年）成书，就180度彻底转变了。《高丽史·列传》卷三十设“郑梦周”本传，说他“天分至方，豪迈绝伦，有忠孝大节，少好学不倦，研穷性

理，深有所得。”“梦周处大事，决大疑，不动声色，左酬右答，咸适其宜。”在儒家理学上，诸如“梦周讲说发越，超出人意”，诸如“诸儒尤加叹服”等赞誉不惜笔墨，并记“李穡亟称之曰：梦周论理，横说竖说，无非当理，推为东方理学之祖。”教育方面，记其“内建五部学堂，外设乡校，以与儒术”，功绩卓著。如此等等，正如“行状”编者说，“其他施罢，利国泽民者，不可胜纪。”^[17]这就是说，对郑梦周的正面的、高度的评价入史，是自朝鲜王府世宗时代开始的。

于是在中国本土，对郑梦周的定性与评价，也随之彻底转变。这就是郑梦周在中国影响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一直贯穿在明清两代。

明万历进士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常熟人）编纂《列朝诗集》，选录明代278年间的诗作，共81卷，入选诗人1600余家，郑梦周的诗，自然是十分重要的选项。

《列朝诗集》仿金代元好问《中州集》，旨在以诗存史，以诗存人。每家诗人均列小传，介绍爵里生平，品评作品得失，资料详略丰富，有些记述的史实，对后世来说十分珍贵。尤其因钱谦益在明末清初是文坛盟主，《列朝诗集》自然影响巨大。顺治、康熙、宣统等各代多次刊刻。康熙三十七年（1698），《列朝诗集》的小传由于价值广泛，深为人所重，钱谦益的族孙钱陆灿曾将其汇集为一编，单独刊行，名为《列朝诗集小传》。小传见解多精辟独到，对郑梦周作了全面介绍和很高的评价，谓“正德中，丽人修《三纲行实》，忠臣以梦周为首。国有人焉，岂非箕子之遗教与！余故表而出之，无使天朝信史，传弑逆之谰辞，以貽讥外藩，且使忠义之陪臣负痛于九京也。”^①《四库全书总目》批评其“以记丑言伪之才，济以党同伐异之见，逞其恩怨，颠倒是非，黑白混淆，无复公论”，这样的指责本身，就是“颠倒是非，黑白混淆，无复公论”的。

按：《三纲行实》为明正德年间朝鲜王府编撰的国民道德读本。钱氏云“正德中，丽人修

① 见《列朝诗集》闰集第六《守门下侍中郑梦周》。

《三纲行实》，忠臣以梦周为首。”可见该书也传到了中原。

《列朝诗集》后来就传入了朝鲜。朝鲜杞溪俞汝舟(1501-?)之妻金氏(义城金寿千之女，生卒年不详)所作诗，也有三篇收入《列朝诗集》，却在朝鲜不传，其七世孙世基编《林碧堂遗集》一卷，共汇集金氏之作七首，《跋》云：

去岁之冬，友人金子昂斗明以书状赴燕，购得钱牧斋谦益氏所辑《列朝诗集》，归以示余。是集也，盖哀取洪武以后诸家诗编为一帙，吾东圃(隐郑梦周)、牧(隐李穡)以下百余家亦得与焉。金氏三篇并诸闺什之首……今因钱公之所撰，始得家乘所不载、世间所不传之三篇，并如前所有四篇为七篇，其亦多矣。

据朝鲜末期所编《同文汇考补编》卷七《使行录》，金斗明作为书状官赴燕京时在清康熙二十一年(朝鲜肃宗八年，1682)十月二十九日，“购得钱牧斋谦益氏所辑《列朝诗集》”东归，俞世基受此激发，于是就有了《林碧堂遗集》之编。由此亦能推断其编成《林碧堂遗集》时间乃在其肃宗九年(1683)。^[18]

《列朝诗集》所选诗，还有另外两位朝鲜作者的诗与郑梦周有关，一方面可见郑梦周在朝鲜半岛的广泛与长期影响，一方面可见其在中原大陆受到的广泛关注。

这两位朝鲜作者的诗，一是南宪的《郑梦周死节诗》二首，一是李崇仁(1347—1392)的《古意》。南宪《郑梦周死节诗》云：

丽季衰微泰运升，群贤攀附总飞腾。

从容就死乌川子，启我朝鲜节义兴。

忠义由来不可埋，平时砥砺且无人。

疾风劲草尤难见，须识高丽一个臣。

对郑梦周的评价，是相当高了。李崇仁《古意》云：“人皆笑翁痴，我独为翁冤”“毕竟噬翁死，宁复顾前恩”。对郑梦周之冤、时人之不义大加针砭。《列朝诗集》在此诗后注云：“崇仁，梦周弟子也，深忧而作此诗。”

而在中国本土，则大约在这时，清代朱彝尊(1629—1709)正在编选明代诗歌总集《明诗综》，朝鲜半岛诗人郑梦周又是必选。《明诗综》100卷，由朱彝尊选录，友人汪森、朱端、张大受、钱枋等分卷辑评，存明代3400多人的作

品，上自洪武下至崇祯，历朝重要作者大致网罗无遗。编辑体例，首卷录明室诸帝王之作，第2卷至第82卷按时代先后编入明朝中外诗家作品。对于明末使节封疆之臣、亡国之大夫、党锢之士、遗民之人清在野者特别注意广为搜罗。但因惧触清廷之忌，所选含而不露之作较多，远未能选出此时期的代表作品。第83卷至99卷，分别辑录宫掖、宗室、闺门、僧道、土司、属国、神鬼等诗。末卷录民间杂歌谣辞155首，以备一格。又因朱氏长于史学，故所选明诗多朝政得失、人物臧否之作，评论亦多涉及一代掌故，常可补史乘所不及。《明诗综》有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自序六峰阁刊本，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现代版本。

在《明诗综》卷九十四中，朱彝尊对郑梦周不但作有简要的生平介绍，还在文末附有按语，对历史的真实性、对史书的价值立场大有阐发，对《高丽史》不没郑氏事迹大加称赏，并由此对清朝所修《明史》作了对比，提出批评。

晚清吴庆坻《蕉廊脞录》，卷五又记清同治年间有《朝鲜诗录》手抄本四册辗转抄阅流传的情况。从《蕉廊脞录》可见，《朝鲜诗录》四册，不仅第一册中即录有郑梦周诗，而且“其后又录郑梦周诗，几盈二册”，即几占了《朝鲜诗录》四册的一半的篇幅份量，可见郑梦周及其诗在中国本土一直以来的影响。

四、郑梦周在当代中国的影响

郑梦周在当代中国的影响，同样也可分为两个时期：(1)20世纪五六十年代；(2)20世纪90年代以来。

就现在所见中国本土现代人对郑梦周的关注和研究，始自新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20世纪50年代。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鲜抗美，在朝鲜半岛北部苔滩岩泉书院发现了郑梦周的遗像和碑文，传到了中国。碑文中称明朝为“我朝”，称明太祖为“我太祖皇帝”，书院正厅供奉的郑公遗像着明服。向中国国内介绍这一发现的是李少一，以为这位郑梦周即郑圃隐可能是明朝出使朝鲜，后留居朝鲜供职的使臣。缘此，

从朝鲜归来的李少一其后撰《关于郑圃隐》一文，并于1962年致信请教著名学者郭沫若、翦伯赞。^①

李少一致信郭沫若，是因他在1962年看到郭沫若的诗集《长春集》中有一首《题善竹桥》诗的题注说：“善竹桥在开城附近，乃高丽王朝忠臣郑圃隐死难处。李氏王朝立丰碑二通称颂之，一为英宗所立，题‘崇祯纪元后一百一十三年’，又一为高宗所立，题‘崇祯纪元后二百四十五年’。”认为郭老可能记错了，把郑圃隐误为郑隐圃，便于1962年5月给郭老写了一信，并附自己所写的《关于郑圃隐》一文，就教于郭老。^②郭老认真对待，就此事请教了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时任副首相洪命熹，于1962年6月3日亲笔给李少一回信说：

我曾直接寄往朝鲜，向副首相洪命熹同志请教。现蒙他回信，得以证明郑圃隐字梦周，是我注为了“隐圃”。但洪老说，郑确是高丽朝的忠臣，明洪武年间曾两次出使中国，并非中国使臣出使朝鲜。您提及的郑的两首残诗，他把全文也抄给了我。他还说，郑梦周书院南北各地有十多处，他将来如路过苔滩时，当探访。如碑尚在，当录寄。

就此事，郭沫若并于1962年7月24日给翦伯赞写信谈及此事。^③在郭沫若给翦伯赞写此信之前，因李少一也写信给翦伯赞请教，翦伯赞也于1962年7月20日复李少一信，说：关于“郑圃隐其人的历史，我和郭一样也不清楚。经请教我校东方史专家周一良教授，知此人在《高丽史》中有传”（传略）；“他替高丽人民做了很多好事，如内建五部学堂，外设乡校，以兴儒术，其他如立义仓，赈贫乏，设水站，便漕运，皆其画也。”“郭说他在洪武帝间两使中国，据本传，他不只两使，而是三使中国。”翦信以下叙郑氏三使经历，其事迹著录的朝鲜文献出处等。兹

略。^④李少一根据翦伯赞提供的线索，对郑圃隐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得知郑圃隐曾先后六次出使明朝廷，除上述三次外，还有三次仅抵辽东，即为明太祖朱元璋所拒绝，未能到南京。李少一对其六次赴京来朝的经历都一一作了考订。^⑤1985年，李少一有《郭沫若与郑梦周》一文，对此事又作了感慨追忆。^⑥

李少一的研究，牵动了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朝鲜副首相洪命熹、北京大学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北京大学著名史学家周一良教授等的高度重视和研究、评价。这就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直至80年代中国本土关于郑梦周研究及对郑梦周的认知与评价的基本情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中韩两国建交，韩国的郑梦周研究即圃隐学热感染了中国学界。像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等，是90年代较早系统梳理、研究郑梦周与韩国性理学的著名学者。其后学者研究、研究生毕业论文等作为选题的已不少见。郑梦周赴京来朝所往返经过的“登州海道”，也成为人们重视的“节点”，如山东省蓬莱登州博物馆袁晓春先生有《高丽使节郑梦周登州史迹考》^⑦、鲁东大学刘晓东先生有《高丽外交家、文学家郑梦周的登州诗赏析》^⑧等。至于《明朝诗词大全》等纸质和电子出版物，收录郑梦周诗者，对于人们阅读和使用，更是普遍。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韩国郑梦周研究学界和郑氏宗亲对郑梦周在中国本土行止遗迹的重视和中国本土相关各地的积极呼应。如郑梦周胸像及诗板落户蓬莱市登州博物馆^⑨，山东日照市成为郑氏后裔寻访地^⑩等。

中国—朝鲜半岛之间的历史上的交通路线以海路为主，几千年中不知有多少像郑梦周这样的人在这片海域上来来往往，为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的连为一体而贡献了自己，留下了难以胜数的历史足迹与精神遗产，值得今人共同珍

① 《翦伯赞复李少一的信》注3，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

② 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3期《郭沫若同志给翦伯赞同志的信和诗》之三十三。学报在发表此信时编为1961年，应为1962年。

③ 《翦伯赞复李少一的信》，《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该学报在《翦伯赞复李少一的信》后加注（注5）云：“郑圃隐（梦周）是朝鲜古代一位著名学者，也是中朝两国人民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使者。研究郑圃隐，对于研究中朝关系史、明史，发展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都有重要意义。李少一同志经郭老翦老指点，悉心研究，没有辜负两位老前辈的指教，终于完成了《郑梦周考略》书稿。”

视,共同纪念,共同传承。

孔子曰:吾从周。这应该是郑梦周几经改名、定名“梦周”,并成为著名儒学家,被韩国人誉为“东方理学之宗祖”的缘起与动因。这样的历史传承,无疑就是“环中国海文化共同体”历史传承的重要内涵。

五、结 语

可以说,结缘于历史人物郑梦周而实现的中韩两方的当代文化合作与密切互动,使郑梦周之思想、诗文、行迹在中韩两国得到当代“落地”,是“环中国海文化共同体”的深厚历史渊源和底蕴在当代传承的一个鲜活例证。它体现了“环中国海文化共同体”这一博大文化传统强大的文化粘合力、凝聚力,也彰显出文化认同所能够达成的生生不息、无法阻隔的精神牵连。这充分说明了崇尚“厚德载物”、有容乃大、以儒家文化为本位的中华文明的巨大涵容性和持久生命力。我们希望这样的儒家文化之花,能够在当代开得越来越香,这样的儒家文化之树,能够在当代越来越茁壮成长。

(附记:本文初稿曾于2013年应邀在韩国江南大学举行的郑梦周学术研讨会上报告过,现几经修改,付梓问教。特此说明。)

[参考文献]

- [1] 曲金良. 环中国海文化共同体重建大战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精义 [J]. 人民论坛, 2014 (24): 54-65.
- [2] 曲金良. 天下一体:“环中国海文化共同体”的历史建构 [J]. 中原文化研究, 2015 (1): 80-87.
- [3] 韩国圆隐学会. 圆隐先生遗迹大观 [M]. 韩国迎日郑氏圆隐公派宗约院, 2012: 252.
- [4] 郑梦周. 圆隐集 [M]. 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 1988.
- [5] 郑来晶. 圆隐郑先生文集 [M]. 韩国大田回想社, 2004.
- [6] 王庆云. 新罗崔致远羁泊山东半岛诗文创考 [J]. 东方学(韩国), 2007 (13): 252-259.
- [7] 徐东日. 朝鲜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以《燕行录》《朝天录》为中心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8.
- [8] 刘福铸. 古代朝鲜使臣的妈祖诗咏: 1 [N]. 侨乡时报, 2008-03-28 (10).
- [9] 刘福铸. 古代朝鲜使臣的妈祖诗咏: 2 [N]. 侨乡时报, 2008-03-30 (10).
- [10] 袁晓春. 朝鲜使节咏山东集录 [M] // 蓬莱文库. 济南: 黄河出版社, 2007.
- [11] 杨士奇. 明太祖实录: 卷七十五 [M]. 三修本, 1418.
- [12] 刘晓东. 高丽外交家、文学家郑梦周的登州诗赏析 [M] // 耿昇, 刘凤鸣, 张守禄. 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01-106.
- [13] 朴现主. 高丽时代妈祖接触考 [J].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3): 26-30.
- [14] 袁晓春. 高丽使节郑梦周登州史迹考 [J].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 65-69.
- [15] 杨雨蕾. 登州与明代朝鲜使臣——以“朝天录”为中心 [M] // 陈尚胜. 登州港与中韩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158-172.
- [16] 楼宇烈. 东方理学宗祖 淑世儒林楷模——郑梦周与韩国性理学 [M] // 徐远和, 卞崇道. 风流与和魂——东方哲学与文化丛书之二. 沈阳: 沈阳出版社, 1997.
- [17] 迎日郑氏圆隐公派宗约院, 编. 圆隐郑先生文集: 卷四 [M]. 韩国回想社, 1985.
- [18] 张伯伟. 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解题(上) [J]. 文献, 2010 (4): 144-168.
- [19] 李少一. 郭沫若与郑梦周 [J]. 郭沫若研究, 1985 (1): 109-123.
- [20] 韩国圆隐郑梦周胸像及诗板寄赠蓬莱 [DB/OL]. (2009-08-20) [2020-12-02]. <http://www.jiaodong.net/news/system/2009/08/20/010612527.shtml>.
- [21] “韩国大儒”郑梦周: 遍访明代新罗人聚集区 [DB/OL]. (2010-05-06) [2020-12-02]. <https://www.chinanews.com/cul/news/2010/05-06/2266168.shtml>.
- [22] 郑梦周嫡孙来日照寻访“新罗村” [DB/OL]. (2011-07-19) [2020-12-02].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719/12/2216869_134466986.shtml.

附图



图 1 《大明混一图》，现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绘制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 年）



图 2 《坤輿万国全图》局部，全图为明万历三十年（1602 年）太仆寺少卿李之藻绘。现南京博物院藏明万历三十六年宫廷彩摹绘本。

Literati’s Sea Journey in the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Community
around China Sea: Zheng Mengzhou’s Crossing the Sea to the
Ming Dynasty’s Capital and Its Historical Influence

QU Jin-lia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01021, 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Korean Kingdoms transformed from Wang’s Goryeo to Lee’s Joseon. Zheng Mengzhou, an important official and literati in the end of the Goryeo Kingdom, crossed the sea for a couple of times to Ming Dynasty’s capital, which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then and in the later history of both China and Korean Peninsula. Zheng’s influence in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eriods. The first period was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g Dynasty when Zheng was characterized as a “powerful official” and “disloyal official” in the reports by Wang’s Goryeo Kingdom. The second period began with *The History of Goryeo* compiled during the early Joseon period. The book changed completely Zheng’s evaluation, which led to Zheng’s evaluation change in China then. When Qian Qianyi compiled *Lie Chao Shi Ji* in the Ming Wanli time, Zheng’ poetry became an important option, and the impact was huge. This poetry book was introduced to Korea during the Qing Kangxi time and was highly valued. In the middle of the Qing Dynasty Zhu Yizun compiled *Ming Shi Zong*, and Zheng’s poetry was also a must-hav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 four- volume *Chao Xian Shi Lu* was spread broadly, which recorded Zheng’s poems with “almost half of the four volumes”. All above shows the influence of Zheng and his poems in China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third period was the modern China’s 1950s and 1960s. It was “a rediscovery” of Zheng, who was highly valued in the New China academic circles. The fourth period is since the 1990s. There have been many Chinese scholars researching Zheng comprehensively, and besides, there have been many joint investigations and commemorations by China and Korea, on Zheng’s historical footprint in China.

Key words: “Cultural Community around China Sea”; Zheng Mengzhou; poetry about sea journey; China; Korean Peninsula; histoical influence

(责任编辑 陈蒙腰)